

浅析阿伦特劳动思想

徐秀美

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2日

摘要

汉娜·阿伦特以其独特的政治哲学视角与深刻的洞察力, 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劳动的复杂面貌, 这一劳动观构成理解现代性危机和人的境况的关键桥梁。基于此, 通过对阿伦特劳动思想的形成语境、核心内涵的系统梳理, 并将其与马克思的劳动思想进行比较, 重释劳动在人类活动中的地位, 对现代社会中劳动泛滥以致公共领域衰退的困境加以揭示和批判, 以期为当代人所面临的境况提供解决路径与理论生长点。在劳动似乎成为社会唯一选择的时代, 阿伦特给我们以警醒: 世界正在终结之处, 正是行动开始之时。

关键词

劳动, 劳动异化, 行动, 公共领域

A Brief Analysis of Arendt's Thought on Labor

Xiumei Xu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pril 20, 2026; accepted: May 11, 2026; published: May 22, 2026

Abstract

Hannah Arendt, with her unique perspective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profound insight, reveals the complex nature of labor in modern society. This view of labor constitutes a key bridg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Based on this, by systematically sorting out the formation context and core connotation of Arendt's labor thought, and comparing it with Marx's labor thought, this paper reinterprets the position of labor in human activities, exposes and criticizes the dilemma of labor flooding and the decline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society, in order to provide a solution path and theoretical growth point for the situation faced by contemporary people. In an era where labor seems to be the only choice for society, Arendt warns us that

where the world is coming to an end, action begins.

Keywords

Labor, Labor Alienation, Get Some Action, Public Domai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劳动问题作为现代性危机的双重显现——既是其生成动因又是症候表征，构成了解析现代社会的关键切入点” [1]在现有研究中，学界对阿伦特劳动思想的分析多倾向于将其置于“大众社会”的历史经验背景中理解，而对她的消费主义的批判性解读上不深入。同时，比较研究也多停留于阿伦特与马克思的对峙面，鲜有在差异中建构互补的可能。本文正是在此研究基础上展开，重理阿伦特劳动思想的核心内涵，并与马克思的劳动观进行系统比较，以揭示二者对劳动地位的不同判断中所隐含的对话空间，进而为当代消费与数字化条件下的劳动处境提供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进路。

阿伦特在《人的境况》开篇就指出“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 [2]，这一素朴的发问正是其对人类现代性危机的深刻关切与忧虑。当劳动逐渐吞噬工作与行动，当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限不再明晰，人类是否正在失去“世界”——那个位于人与人之间、赋予生命以本真意义的共享现实，而当“世界”不断坍塌，我们要靠什么重建人的尊严。阿伦特从其亲历的流亡与战后西方虚假的繁荣出发，并结合当时消费主义兴起的现实，形成了其独特的劳动思想。这一理论不仅是她个人生活的座右铭，更是其哲学的宣言，旨在重建捍卫世界性本身的哲学行动。

2. 阿伦特劳动思想的形成语境

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绝非偶然，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主、客观条件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思想家的理论素养、思维能力构成了思想形成的主观基石，而个人的生活经历、人生体验则作为客观土壤，为思想的萌发与成长提供养分。阿伦特的劳动思想也并非书斋里的逻辑推演，而是植根于二十世纪动荡与变革的社会现实，促使阿伦特对人类的生存状态进行反思，并试图探寻解决之道，倘若我们无法“身临其境”式的理解她所面对的“世界的敌人”，也就更加理解不了其将劳动视为现代社会危机的核心症结。

2.1. 消费浪潮与现实隐忧

消费社会可谓是对公共领域的慢性消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苏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兴起，阿伦特察觉到一种危机：劳动解放并未导向真正的自由，反而催生了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形态，进一步消解了人类构建持久世界的的能力。在消费社会中，劳动的性质产生了根本性的颠覆，它不再是仅为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而是为了汲取大量财富以支持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人们陷入对物质消费的无尽追求中，劳动被简化为获取金钱的手段，而劳动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则被忽视，人们在消费的漩涡中越陷越深，“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 [3]。

正如阿伦特所说：“劳动动物的空余时间只会花在消费上面，留给他的空闲时间越多，他的欲望就

会越贪婪越强烈……” [2]。但消费社会呈现出的是一种虚假繁荣，看似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实际却掩盖了劳动异化的本质：劳动者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地生产商品，却无法真正享受劳动的成果，不仅生产的产品失去了持久性，就连劳动者本身也沦为可置换的消费符号生产者。在这种语境下，人成为“消费人”，陷入“生产-消费”的循环怪圈，更有甚者，公共领域被这种工具理性所吞噬，“世界”不再持存，行动也失去了空间，社会成为一个将人囚禁在生物性存在的牢笼。

2.2. 亚里士多德：“人的活动”的三重区分

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将人的活动区分为理论(沉思)、实践(行动)与创制(劳动)，为阿伦特的劳动思想提供了结构性框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或思辨是指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和对世界本质的探索，它以自身为终极目的，不受任何束缚，是自由的和最高级的人类活动，是最接近神性的。实践主要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道德行为，多关乎政治生活，以自身为目的，因此具有一定的自由性，但它又受到必然与非必然因素的限制，故并非绝对自由。创制则是与生产、制造相关的活动，以产品制造为目的，必然受一定技艺和手段的限制，是不自由且最低级的活动，多由奴隶承担。

正是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暗含等级的垂直结构塑造了阿伦特“劳动-工作-行动”的三元框架。她将创制拆解为劳动与工作，劳动是指生命必需品的循环再生产，工作是关于持久人造物的创造，而行动则作为政治实践的最高形式，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公共领域自由本质的推崇。当流水线生产将人类降格为“劳动动物”，当技术造物构筑起物质世界的牢笼，亚里士多德的“创制”早已异化，这使阿伦特意识到公共领域在技术理性的扩张中持续坍塌。她的三元框架既保留了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实践的本体论承诺，又将创制撕裂为现代性批判的双重战场。

2.3. 海德格尔：实践哲学

海德格尔的实践哲学为阿伦特的劳动思想提供了存在论框架，“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反应” [4]。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揭示的“操劳”概念，颠覆了传统哲学对实践的认知。在他看来，实践是人的良知，是“此在”的一种存在状态，即“在世界中存在”，而创制则需要通过实践来解释，强调人通过工具性操劳与周遭世界建立最初的联系，批判了传统哲学将实践窄化为道德政治活动，突出了技艺制作等活动的本源性和非工具性。并且他还指出，实践与创制二者存在的客观条件不同，因此衡量标准也不同，并不存在谁更具优越性。基于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阿伦特认为，劳动作为维持人类生物性存在的活动，不足以显示人的创造性及自主性(应由工作与行动来展现)。

此外，海德格尔对现代性困境的揭示，如技术统治下人的异化与存在遗忘，也使得阿伦特关注到劳动在现代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劳动被过度工具化，劳动者成为生产机器的附庸，从而丧失了作为人的自主性与尊严。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强调了个体朝向本真状态，是孤独的“此在”，而阿伦特则将其转化为向公共领域的复归，不是退回到诗意栖居，而是通过积极行动摆脱劳动异化，重建公共领域，回归真正的人类存在状态，进而使劳动在世界网格中处以适当位置。这一理论构建与海德格尔的思想脉络紧密相连。

3. 阿伦特劳动思想的哲学重构

阿伦特的劳动思想并非是对传统观念的简单贬义，而是基于人的境况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重构。人类本质上是受处境规定的存在，必然会受到生存环境的制约，因此，劳动被界定为最基础的活动，其直接服务于人类最基本的需求——维持个体生命的存续，体现出人类与自然界其他生物相似的一面。并且，阿伦特认为与人的境况相对应的活动除了劳动外，还有工作与行动。工作指向的是一种更具创造性的领

域，人类通过工作构建起一个属人的世界，将自己与其他生物区分开；行动则将人与区别人，人们通过行动去切入世界，进而建立起真正的联系，这三种活动构成了阿伦特对积极生活的基本构想。但由于现代社会“世界的异化”，劳动、工作及行动都被降格为满足生存需要的工具，社会演变为消费之上的场域，人也沦为“消费动物”。

3.1. 何为劳动

阿伦特认为，“劳动是与人身体的生命过程对应的活动，身体自发的生长、新陈代谢和最终的衰亡，都要依靠劳动产出和输入生命过程的生存必需品。劳动的人之条件就是生命本身”[2]。即劳动是与人类生物性生存直接相关的最基本的活动，其核心目标是满足人的基本生命需求，可以理解为是人类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人们凭借自身的本质力量从自然中获取生存所需，同时对自然进行一定的改造。正如马克思所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5]。

在现象学的视域下，阿伦特指出劳动的三大特性：必然性、循环性与无世界性，这也是阿伦特对劳动进行现象学分析的原创贡献。劳动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其受制于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源于人类基本的生存需求：人类要想生存就必须劳动，劳动是不得已而进行的活动，是人类无法逃避的，伴以痛苦性、操劳性甚至是奴性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古代奴隶制提供了合理性证明。“因为人受到生命必需品的统治，他们就只能通过统治那些由于被迫而服从必然性的人，来赢得他们的自由”[2]。同时，人的自然生理需求是无穷尽的，要想生命得以延续，就必须周而复始地劳动，从自然界获取生存资料，又经生命代谢复归自然，“总是在同一个循环上轮回，这个循环是生命有机体的生物过程规定好了的”[2]。但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代谢只能暂时维持世界的稳定，不能建构持存的人造世界。因为劳动的产物具有即时消耗性，几乎是生产出来就被消费掉，劳动周期所呈现的是“劳动-消费-劳动-消费”的模式，劳动产品因其非持久性无法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人也被降格为“劳动动物”。这种“无世界性”使人受制于在劳动必然的私人领域中，被公共领域排除在外，难以参与真正的政治行动。“劳动提供生命必需品，因此它迫使每一个人关注自己的身体需要，而不是关注共同世界以及复多个体之间的互动”[6]。

3.2. 何以区分劳动、工作与行动

劳动的本质在于其维持个体生命的存续，这一特性也就决定了劳动始终无法摆脱必然性的束缚，始终与自由保有一定距离，再加之劳动的循环性、无世界性，我们不难看出劳动活动所体现的三重困境。其一，时间性困境构成了劳动的第一重桎梏。劳动的产物在满足生命需求的瞬间便完成了它的使命，即时消耗，这也使得劳动被困于永恒的循环中，无法创造出具有持久意义的世界。其二，空间性困境显示劳动的存在论局限。劳动被严格限定在私人领域之中，既不需要他人的见证，也排斥不同主体间的对话与交流。在这一封闭空间内，劳动者犹如被困于柏拉图的洞穴中，其活动无法转化为公共领域的共享经验，进而丧失了被他人看见与听见的可能，仿佛隐形存在一般，尽管他们的劳动支撑着社会的运转，但始终无法于公共领域展现自身的独特性。其三，价值性困境则触及了劳动的意义危机。在阿伦特那里，劳动是作为维持生命必需的基础活动所存在的，但在现代社会，劳动的地位被提升至衡量一切价值的尺度，是追求幸福的根本途径，这似乎是我们“活下去”的唯一目标。实际上这不过是对生命必然性的一种屈服，我们把自己当成了一种高级的、会消费的“劳动动物”，而不是能够参与公共生活、实现自由价值“政治动物”。

与劳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工作，这一活动对应“世界性”的人的境况。在阿伦特看来，工作并非受必然性所驱使，而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它是一种非自然性的创造活动，人们运用自身能力通过工作创造出一个属人的客观世界，即人造物的世界。但工作不同于劳动的短暂性，其首要意义就在于其世界

建构的功能，具有时间性与空间性。一方面，人们通过工作所制作出来的人造物产品具有相对持久的存在形式，超越了个体生命的限度，成为人类对抗时间流逝的一种象征，也正是因为这些人造物的持久性存在，赋予了人类生活以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使人不必每天从头开始构建存在的根基，进而形成一个稳定的客观世界。另一方面，工作的场域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中间地带，它通过对象化实践所创造的桌椅等持久物，为人们提供了施展其主体性的一方天地，有了共同的言说对象，进而突破私人领域的封闭性，相比劳动所带来的短暂幸福感，人从制作过程中获得的满足感则更为持久。但也要明确，工作因其“模型性”——依赖预先的模型或蓝图而进行创造，使其始终受制于“目的-手段”的工具理性逻辑，进而导致社会的一切价值都被量化为可计算的标准，人类的多元存在方式也被单一化至功能性维度，并未进入到真正的政治行动领域。

而作为人类活动最高形式的行动，则与“复数性”这一境况相对应。“行动，是唯一不以物或事为中介的，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与之对应的是复数性的人之条件，即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人们”[2]。换言之，劳动与工作本质上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活动，而行动则完全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不需要中介就可完成的、多数人之间的活动，对应复数性。其包含双重维度：一方面，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拥有不可替代的生命叙事，这是差异，恰恰因为差异我们才需要对话和交往；另一方面，在公共领域中，每个人都共享平等的言说与行动的能力，这是平等，因为平等我们才能共同处事。在人们的生命需求被劳动与工作满足之后，就有了更高的目标，想要展现自己的价值，这就需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言说与行动来实现。阿伦特认为，行动与言说是人们真正切入世界的“第二次诞生”，劳动的领域是私人的，工作的领域工具的，只有行动的领域是公共的，也只有在行动中人们才能展现出自己的自由意志与主体性，并与他人建立真正的联系，每个政治行动都蕴含着“开端新启”的奇迹。她直言，那些仅仅过着私人生活、被排除在公共领域外的人，不论是因为像奴隶一样被禁止进入，还是像野蛮人一样不曾建立这样的公共领域，他们都不算是完全意义上的人。因此，只有行动才是真正体现人本真性的活动，是劳动的最终旨趣。

3.3. 何以看待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

阿伦特的劳动思想与她的领域理论密不可分。在她看来，我们在探究每一种活动时，首先要找到这些活动发生的场所和源头，“因为每个活动都有其特定的空间：行动是公共性的，而劳动和制作必然是私人性的”[7]。

私人领域是劳动的天然归属，劳动的目的在于直接满足人的生存需求，具有隐蔽性和非公开性。在古希腊，人的活动空间被明确区分为城邦与家庭，二者截然不同，城邦是公民参与政治事务的场所，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生活空间。家庭是劳动私人领域的核心场域，奴隶、妇女和儿童在家庭中开展劳动活动以创造生活必需品，进而保障自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阿伦特指出私人领域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不平等与暴力：一方面，主人会通过行使暴力强制手段来支配奴隶的劳动；另一方面，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维系也基于权威而非平等对话，这体现了私人领域隐蔽性下的被剥夺性。

相对而言，公共领域则是人们摆脱了生存必然性而自由进行政治行动的场域，是公民通过言说与行动来展现自我、参与政治生活的舞台。其核心特征在于它的公开性与持久性。公开性意味着在公共领域下，每个人的言行都会被其他人看到或听到，人与人直接的交流是公开性的，而且一千个人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看待问题或事物的视角不同，也就展现出公共领域纯粹的多样性，多样性才显现世界的实在性。持久性则意味着行动与言说可以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为世界留下集体记忆与载体。

伴随科技的迅猛发展，现代社会却逐渐模糊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限。劳动从私人领域扩展到公共领域：工厂将劳动流水线化、市场将劳动产品商品化、媒体甚至将私人生活变为公共话题等等，这

种看似“劳动的胜利”却导致了公共领域被经济活动所占领，而真正的政治行动反而被边缘化，甚至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就像现代人在消费主义的盛行下，误以为“工作”是实现自我的核心，而忽视公共参与的价值，长此以往人将沦为“劳动动物”，丧失构建世界的能力。

4. 阿伦特与马克思劳动思想的对话与分歧

“马克思和阿伦特都是极具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的伟大政治思想家，一方面他们都敏锐地把握到了变化的核心，并试图针对时代困境提出自己的解释与方案，但另一方面，他们的理论脉络是与其各自对人本身的理解一脉相承、紧密相关的”[8]。应该说，二者的劳动思想既有深刻的差异，又存在着相通之处。

4.1. 对劳动本质的概念界定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以生产关系为切入点，指出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也必将塑造人本身，是人类生存与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变为异化劳动，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及他人相异化，但这种异化最终会激起并重建劳动的本真性，恢复其自由自觉的本质，而不是否定劳动。劳动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媒介，使人摆脱必然性的限制以参与政治行动，进而使得劳动从维持生存的手段上升为自由自觉的活动。由此可见，马克思对劳动的关注点在其经济和社会关系属性，强调劳动在物质生产和社会变革中的巨大作用。

而阿伦特对劳动的理解则是从现象学和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对其采取了更为限制性的定义。在“劳动-工作-行动”三元框架中，她将劳动视为一种必然的、低层次的活动，被严格限定为与个体存续所必需相关的生命活动，反对将劳动的范围拓展到人类其他活动的领域。在她看来，劳动固然是必要的，但人不应该被其所支配和主导，马克思则将劳动的领域混淆及延展到人类其他活动的不同领域，进而导致劳动被抬高到政治行动的地位，掩盖并化约了“行动”的真正意义，必然性也就取代自由成为人类公共生活的组织原则，现代性危机爆发。

综上，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劳动解放”可以实现，并在社会变革中发挥巨大作用；阿伦特则认为劳动是受制于自然必然性的基础活动，不能使劳动成为主导，而应当通过行动来实现人的本真自由。

4.2. 对劳动异化的关切与批判

尽管阿伦特与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界定截然不同，但二者均洞察到社会中劳动异化的现象。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出“异化劳动”的现象，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的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9]，成为异化劳动。异化劳动具有四重规定性：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与自己的劳动、与自己的“类”本质及其他劳动者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变为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活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剥削劳动，而且劳动力也成为商品，劳动者不再是自己劳动的主人，而是资本的奴隶，其存在方式已然被扭曲。

马克思将异化劳动视为一种非自由且不体现人生命本质的状态，而阿伦特的劳动恰恰跟他是相似的。对阿伦特来说，劳动是一种必然性的活动，是人们为了获得生存必需品而不得已进行的活动，要生存就必须劳动。但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技的进步与消费主义的盛行，劳动已然被异化为一种纯粹的工具或手段，丧失了其原本的意义和价值。此时的人们不再是为了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而劳动，而是为了追求

金钱、地位等外在物质需求，忽视公共领域的政治生活与行动，这就使人的自由被困于异化的劳动下，成为“劳动动物”，进而陷入无尽的空虚之中，是“世界性的丧失”。

因此，阿伦特与马克思均洞察到社会中的劳动异化现象，尽管二者的批判角度与深度不同，但不论是阿伦特的劳动与“世界异化”，还是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及“社会异化”，都揭示出劳动过程中人的本质与自由的丧失，人处于极度不自由的状态，反映了他们在不同的时代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

4.3. 对人类自由的不同理解

阿伦特与马克思在劳动概念及异化劳动上的对话与分歧成为理解二者思想的桥梁，不仅关涉劳动本身的定义，更关乎对人类自由和实践本质的不同理解，二者在对劳动解放与人类自由的关系上分道扬镳。

马克思坚信“劳动解放人”。他认为，人类首先要解决自身生存的物质生产问题，然后才能追求更高层次的发展，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无疑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劳动解放创造了条件。他在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中指出，劳动解放意味着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废除，劳动者重新掌控生产过程，此时的劳动不再是为了外在的物质性目的，而是确证自身的主体性，充分展现自己的创造性，进而实现个人价值。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0]。马克思对劳动解放的理解，超越了单纯的物质生产层面，指出这种解放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解放。

阿伦特则对劳动解放的政治意义提出了根本性质疑。在她看来，劳动是为了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一种重复性的、不可避免的自然过程，其特性就是必然性、单一同质性，并不具有自由属性，本质上也与自由背道而驰。因此，劳动的解放并不意味着人类的自由，而只是“劳动动物”的胜利。当劳动的私人领域侵入甚至支配行动的公共领域时，其结果必然不是自由的扩大，而是政治生活的消失。阿伦特指出，“劳动的解放和同时发生的劳动阶级摆脱压迫和剥削，的确意味着在非暴力方向上的进步，但不意味着在自由方向上的进步”[2]。这也正是现代社会的悖论：人们在征服必然性方面取得了空前成功，却丧失了真正的政治自由。因此，她主张自由应当通过公共领域的“行动”来实现。行动是人类积极生活中最高级的活动，不仅是个人行为的表现，更是公共领域彼此互动的结果，展现出人的自由、创造和政治属性。重新建立起公共领域，通过言说与行动实现公民的复数性。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解放忽视了公共领域的重要性，会导致公共领域的消亡以及人的工具化倾向。

尽管阿伦特对马克思的劳动解放提出质疑，但她并不否认马克思思想中的批判精神和解放诉求，从根本上来说，二者的深层指向与最终旨归是一致的，都谋求人的自由发展，其区别更多在于对自由路径的不同构想，而非最终目标的根本对立。可以说，阿伦特所强调的行动，即人与人之间的参与互动，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期待的回归人本质的劳动的一种方式。

5. 阿伦特劳动思想的当代价值

阿伦特的劳动思想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尽管学界对阿伦特本人及其思想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她所构建的“劳动-工作-行动”的三元框架如同一把解构现代性困境的哲学手术刀，对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5.1. 丰富发展劳动理论

由前文可知，阿伦特的劳动思想体现着她与马克思对扬弃劳动异化的共同关注，她从劳动的结果角

度揭示人的“劳动动物化”危机，这为我们全面理解与研究劳动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阿伦特对劳动的生物性本质的解读，将在她之前的异化劳动理论推向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哲学维度。在她看来，劳动作为一种“生命过程本身”的活动，其内在是复杂的、矛盾的。一方面，劳动是维系人类物种延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活动，是人类生存繁衍的根本保障；另一方面，因其重复性和机械性特征，劳动成为对人类自由的一种束缚。

这种辩证的观点突破了传统对劳动价值的单纯经济学化约，将劳动这一概念从经济层面提升到哲学存在论的高度，拓展了劳动概念的范畴，从而为理解劳动的本质提供了新的思路框架。当下流水线工人每天长达10小时甚至以上的重复劳动、外卖骑手被困于大数据算法中等困境，一方面印证了异化劳动理论的消极影响，一方面也突显了阿伦特所警示的“劳动动物化”危机。当劳动完全退化为一种单纯的生存手段时，人类作为复数性存在的独特本质便被无情地消解。

虽然看起来阿伦特与马克思对劳动的观点存在差异，但二者对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探寻中，都是基于劳动。阿伦特的劳动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相似，阿伦特要从劳动走向行动，马克思要扬弃异化劳动，事实上二者在起点和终极价值目标上都存在相似性。在此意义上，阿伦特在马克思之后无疑丰富了劳动理论，让我们能以更多视角理解劳动和自由，也利于构建有关“劳动”的多元理论图谱。

5.2. 深化对现代性危机的理论反思

阿伦特的劳动思想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危机问题。一方面，她认为现代性危机的核心是“世界异化”，即公共领域的衰落。现代技术的演进与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劳动效率不断提高，劳动的领域也不断扩张，从私人领域逐渐侵蚀到公共领域。在这种劳动社会中，人成为了“劳动动物”，还持续性的沉溺于“劳动-消费”的恶性循环中，丧失了政治行动的主体能动性，忽视了亚里士多德提及的“政治动物”的意义。这种异化会逐渐消解人的“复数性”，存在一定程度的潜在危险。另一方面，她还深刻批判了现代技术将劳动机械化、流水线化的现象，这使得人类的创造力被消磨掉，逐渐沦为流程化的生产工具，这种自动化可能会加剧人类生命过程的空虚性，即精神价值的丧失。

阿伦特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为我们警惕当代劳动的“扩张化”趋势及技术伦理研究，提供了哲学理论依据与独特的分析视角，有助于构建更加全面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体系。在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阿伦特的思想帮助我们进行根本性的反思：技术解放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人工智能与自动化的发展只是为了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消费和娱乐，而不是为了更高效的参与政治行动，那么这种解放是真的自由吗？阿伦特的回应显然是否定的，我们必须要从“劳动动物”转变为政治行动，否则在技术理性的统治下，人们的主体性只有被吞噬的结果。

5.3. 公共领域的重建与政治行动的复归

阿伦特对世界的终极关切就在于公共领域的重建与政治行动的复归。在她看来，现代性危机源于劳动的私人领域侵入到公共领域，公众的讨论被经济议题所主导，公民身份被消费者身份所取代，以致真正的政治行动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因此，恢复阿伦特意义上的政治行动是迫切的，即在公共领域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自由的对话与协商，以此来面对技术伦理、工具理性、全球正义等新型政治问题。并且，阿伦特指出，行动具有“开端启新”的功能，这种功能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每个人在公共领域都可以开启新过程、创造新可能，这也就打破了传统技术专家统治的神话，恢复了普通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主体地位。

同时，阿伦特的行动观彰显其“爱这个世界”的哲学态度。一方面，“爱这个世界”意味着拥抱人的复数性。在公共领域内，每个人的言说是可以被听得见的，每个人的行动也是可以被看得见的，要学会

接纳多样性的主体与意见，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寻求共识。也正是这种复数性构成了政治生活的基本条件，是实现自由的根本保障，人们通过言说与行动真正的切入世界，开创新的奇迹。另一方面，“爱这个世界”也意味着对世界责任的承担，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积极的守护。这种责任意识在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日益突出的今天显得尤为珍贵，呼吁我们培养超越个人利益、关注共同世界的公民德性。

6. 结语

阿伦特的劳动思想，是她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反思，对当今社会依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但也要明确，她的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她贬低劳动的价值(因为她对劳动的理解与马克思有差异)、对行动过于理想化的期待等，这就要求我们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劳动思想和世界发展的视域中，借鉴其思想中的合理之处，来应对当下人所处的生活困境。

在当下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技术更迭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而且技术的精密化与自动化程度，使得各种流程之间几乎是无缝衔接，也迫使人们不得不加快步伐，基本没有时间停下来进行深入思考。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情感感受往往被忽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并正确理解劳动、工作与行动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角色与意义，要注重在劳动过程中把握主动性，努力摆脱技术对人的异化作用，追求个体的全面解放与发展，进而更好地应对技术进步带来的挑战。劳动的痛苦无法消除，但可以被赋予意义，即便处在“黑暗时代”，我们依旧可以通过具体的言说与行动为世界留驻空间。

参考文献

- [1] 王雪. 汉娜·阿伦特劳动理论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25.
- [2] 汉娜·阿伦特. 人的境况[M]. 王寅丽, 译. 第2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 [3]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9.
- [4] [英]迈克尔·莱斯诺夫. 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M]. 冯克利,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82.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19.
- [6] [英]玛格丽特·卡诺凡. 阿伦特政治思想再阐释[M]. 陈高华,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26.
- [7] [美]赛瑞娜·潘琳. 阿伦特与现代性的挑战[M]. 张云龙,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58.
- [8] 安昭君, 曾天雄. 论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自由观的理解[J]. 广东社会科学, 2022(4): 73-80.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1.
- [1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37.